

# “藏族为中华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 ——访著名藏学家王尧先生

□ 本刊记者 杨 君



【编者按】王尧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藏学家，1928年出生，江苏涟水人。现任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王尧先生在藏族史、

藏传佛教、敦煌藏文献、藏族文学、藏语言等领域都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吐蕃金石录》、《吐蕃简牍综录》、《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吐蕃敦煌文献选》、《藏剧故事集》（汉、英文版）、《宗喀巴评传》、《西藏萨迦格言译注》、《藏学零墨》、《西藏文史考信集》（大陆版和台湾佛光出版社版）、《藏学概论》、《西藏文史探微集》等20余种，发表论文数百篇。

11月的一个下午，天气微凉，我们如约前往中央民族大学采访王尧先生。之前和王先生有过一些接触和交谈，这次能够近距离地倾听他对人生、学术以及民族宗教问题的种种感悟和见解，就如同一幅连绵80载的人生画卷缓缓铺展于眼前，厚重而和煦，让我们获益良多。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记者：王先生，我们知道您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到了藏区，能讲讲这段不寻常的经历吗？

王先生：上世纪50年代初，中央为筹办中央民族学院，从全国文科大学生中抽调人力。当时我正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1951年5月初就被调到了北京。当时国家很重视民族工作，周恩来总理和李维汉同志对我们也有安排和嘱托：在边疆地区生活的主要是少数民族，民族工作对国防、政治有重大意义，一定要做好，你们这些年轻的同志要到边疆去工作。我被分配到的地方就是等待解放的西藏。

记者：当时您对西藏和藏语有所了解吗？

王先生：刚到北京时，对于西藏和藏语，我可以说是毫无了解，胸中茫然无绪。“去吧！到西藏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当时年轻人最响亮的口号。想到祖国的需要、西藏解放的需要，我们急着想早日学会藏语，早日承担起祖国交给我们的任务。

记者：到北京以后您就开始学习藏语了？

王先生：是的。感谢著名藏学家于道泉教授，他以最大的热情和耐心帮助我们学习藏语。他设

计了一套用拉丁字母拼写藏语的方案，还编出若干生动有趣的口语教材。在于先生的安排下，我们还跟藏族老学者曲吉洛卓先生（汉名李春先）、云南藏族钟秀生先生、巴塘藏族格桑居勉先生、拉萨功德林寺派驻雍和宫的僧官土登尼玛喇嘛、罗桑曲准女士学习过藏语。因为我们住在北长街的班禅办事处后院，也有机会跟藏族官员接触，向他们学习语言。

我是1952年进入藏区的，其实当时在语言方面只能说是打下了最初的基础。我们先到今天四川甘孜州贡嘎雪山上的贡嘎本寺（藏名“康松扎”，意思是“名闻三界寺”）跟藏族著名学者贡嘎上师学习藏语和藏文化，我记得上师当时是以《萨迦格言》、《米拉日巴传》、《佛陀释迦牟尼赞》等三部涵盖文史哲的藏文典籍为教材。在贡嘎山上生活的日子既紧张又活跃，充满了乐趣，既有诸多难关，又有克服困难后的欢乐，让我至今萦怀难忘。

### “藏传佛教蕴藏在西藏人民的生活当中”

记者：当时您跟当地民众接触很多吗？

王先生：是的。进入藏区以后，我们跟当地藏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可以说是深入他们的生活。这让我们语言能力进步很快，同时丰富了多方面的藏文化知识。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一段经历。

记者：当时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王先生：当时对西藏了解很少，只是觉得藏区和内地生活习惯不同，在很多方面差别很大。比如西藏当时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和等级差别，贵族连讲话都和平民不一样，他们说的是一种雅语（敬语），以表明身份和教养。当然，我们也迅速掌握了雅语，和他们打交道就很自如、方便了。

我最大的体会跟宗教有关。藏传佛教蕴藏在西藏人民的生活当中，是他们全部的精神生活。特别的是，他们虔诚地信仰佛教，有精神上的寄托，却没有为自己个人私利的追求，我觉得这个民族是很了不起的。在青藏风雪高原严酷的自然环境下，藏族民众能够克服种种困难，创造出一整套西藏文明，藏传佛教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藏传佛教对藏民族的影响，是一千多年来逐渐形成和积累的，几乎深入到他们每个人身上。

记者：能给我们举个例吗？

王先生：记得有一次，我借住在山南一对老人家中，他们有七八十只羊，每天早晨，老汉赶羊上山，老太太都给他准备好足够的茶叶、酥油、盐和糌粑，装进袋子藏在怀里。把羊群赶到半山吃草，老汉就用三块石头支起一口钢精锅，煮茶、诵经，非常虔诚，同时也很怡然自得，这就是他们乐天的精神生活。正是这种精神力量使他们满足。尽管藏区人民物质生活贫乏，精神生活却相当富有，这是藏传佛教对他们最大的影响之一。这就跟当前社会上一些人极度的物欲膨胀形成了鲜明对比：有钱，有富足的物质享受，精神上却常常空虚。

### “我对藏民族、藏传佛教文化精神的几点体会”

记者：其他更具体的方面呢？

王先生：通过半个多世纪接触，我对藏民族、藏传佛教的文化精神有几点体会。

一、慈悲心、同情心。藏族人家围坐在一起喝茶、吃糌粑，一定要开门看看门外有没有乞讨的人，如果发现就会把食物分一些给他。他们觉得单独吃东西是可耻的。他们怜悯、救助贫苦、残疾者，而不是嘲笑、轻视他们。我觉得，这种慈悲心、同情心跟藏传佛教长期在藏区占主导地位有直接关系。

二、宽容心。藏民族在日常生活的很多方面都少有嫉妒心，而保持一种平和、自然的心态，他们的这种性格特征是很突出的。



1985年，王尧先生（左）参加在慕尼黑举行的国际藏学研究大会

三、藏传佛教里很多护法神造像呈狰狞恐怖、鼓目圆睁的愤怒相。与其他民族面对这种造像容易产生恐惧感不同，他们认为这些神灵对妖魔凶狠，对百姓却很慈祥，在他们的护佑下，很有安全感，可以避免任何灾难。像拉萨附近色拉寺的马头观音，形象凶猛，但附近怀孕的妇女都要去朝拜，认为可以获得护佑。

四、藏传佛教与家庭、社会的关系跟汉地佛教有所差别。汉地僧人离家住寺，和家庭基本脱离了关系。藏区僧人则完全不同，很多比较富裕的家庭在寺院中都有自己的寮房甚至院落。藏族民众学习文化、医学、绘画等技能都是到寺院里去，但寺院不供给僧人粮食等日常所需，僧人每两三个月要回家取一次，也可以通过劳动换取。在西藏，家庭、社会和僧人、寺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是藏传佛教和当地百姓关系密切的原因之一。不认清这种关系，无法真正了解西藏的社会和文化。

五、藏传佛教有严格的学阶制度。学阶制度是藏传佛教培养高级僧侣的制度。藏传佛教僧侣从入寺学习开始，逐级地修习必须的佛教课程，并通过辩经取得成绩，一般都得20多年，才能学成圆满取得格西学位（格西又分4等，在班禅系统叫作噶钦）。学阶是通过严格的考试取得的，入寺学习的僧人有明确的课程、次第，可以说，藏传佛教寺院就是一所佛学与文化的学校。



1983年，王尧先生（右）与法国巴黎科学院院士、汉藏学家石泰安（左），法国藏学研究中心主任布隆多夫人（中）合影

六、13世纪由噶举派兴起的活佛转世制度，是以名人效应和灵魂转世思想为基础构建而成的。后来藏传佛教各个宗派都相继推行，尤其是格鲁派把这一制度进一步规范化。在清王朝的支持下，藏传佛教形成了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成为藏传佛教的特征之一。在藏区，活佛制度和学阶制度是平行的，活佛制度一般要服从于学阶制度，有学位的活佛和僧侣更能获得尊敬，大活佛一般都要取得学位。普通民众把活佛、大喇嘛看作是生活中的朋友和导师，遇到家庭纠纷、各种疑难等等，都要向他们请教、请他们指点。这也是理解藏族同胞宗教信仰、宗教生活时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

### “‘西藏学’已成为一门显学”

记者：您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与西藏学》，您怎样定义“西藏学”？

王先生：简单地说，“西藏学”就是研究西藏的学问。还要把“西藏”二字解释清楚：西藏是位于我国西南边陲的一个广阔地区，目前称为西藏自治区。在历史上，对这一地区有不同的称呼，唐、五代、宋，一直到元代都称之为“吐蕃”。古人按照当时藏人自称为Bod（蕃），汉语译为吐蕃，发音为“吐博”或“吐钵”。而“吐”字很可能是汉语“大”字的唐代发音，合起来，就是藏人的豪言壮语——大蕃（见于公元823年立于拉萨的唐蕃会盟碑）。明代称为“乌斯藏”，清代称为“卫藏”，实际上是藏语Dbus-gtsang的译音。除了西藏以外，藏族还分布于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四省，分别在各省建立了自治地方（自治州、自治县）。西藏学研究就包括西藏自治区和上述四省的藏族自治地方在内。在西方，习惯上称西藏学为Tibetan Studies或Tibetology，咱们自己有时简称为“藏学”。

这一学问是跨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性研究学科，实际上包括语言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宗教学、文学、艺术、美术、雕塑、绘画、音乐、舞蹈、民间说唱、戏剧、天文、历法、藏医藏药、建筑、桥梁等多种学术领域。而藏语文恰好是入门的钥匙。

记者：您最初是从学习藏语开始的吧？

王先生：是的。我接触西藏学，正是从50年

代学习藏语文开始的。在这一过程中,我觉得,这个民族确实为中华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是多方面、多领域的,值得进一步深入地研究。

记者:目前西藏学在国际国内学术界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研究状况?

王先生:国际上研究中国的学问有蒙古学、突厥学、满洲学、汉学、敦煌学等等,西藏学也是其中之一。过去人们认为汉学就能代表整个中国学,这是不全面的,因为不能涵盖整个中华民族。过去,国外一直认为西藏是个极端神秘的地方,了解的人不多,能够研究的人就更少了。现在情况有了改变,到西藏做田野调查的人也多了。现在,国外不少大学都有藏学研究机构,参与其中的学者很多,还有专门的国际会议——国际藏学研究大会,每三四年定期举行一次,供全世界的藏学研究者发表研究成果、交流经验。1981年,国内第一次派人参加国际藏学研究大会,只有我一个代表。而现在,每次国内都派出几十人参加,说明国内西藏学研究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北京设立了藏学研究中心,西藏、青海社会科学院都有专门的藏学研究机构。总之,现在国际国内的藏学研究,就如季羨林先生和任继愈先生在上个世纪所预言的那样:21世纪研究中国的学问中,藏学将是一门显学。

### “以不变应万变”

记者:随着青藏铁路的开通,藏文化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的关注。作为藏学家,您怎样看待藏文化的神秘性以及原生态等问题?

王先生:西藏地处世界屋脊,人迹罕至,藏文化的神秘感以及原生态都与此有关。但藏文化决不是封闭的文化。汉地文明向西藏的传播姑且不论,公元11世纪以来,以藏传佛教为代表的藏文化,不断向内地以汉文化为代表的主流文化靠拢,这是一个长期不断的过程。正是这种持续近千年的靠拢,使藏文化牢固地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人类社会的发展演进,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随着青藏铁路的开通,西藏与外界交流更加频繁,因为不了解而产生的神秘感会逐渐消失。但是,那些有着独特民族特点

的文化并不会就此湮没,而是作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永葆青春,如藏族歌舞、绘画、音乐、医药、天文、立法等等,都是如此。

记者: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古老的藏区应该如何应对?

王先生:全球化和现代化应该为世界各个民族带来同等的进步和发展。面对这种趋势,藏区是“以不变应万变”。藏族民众同样希望,也同样有权利过上现代化的生活,利用全球化和现代化带来的种种有益和便利的事物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但同时也会拒绝和排斥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与古老传统和习俗相违背的行为。

### “将民族、宗教的和谐放到重要位置”

记者:您曾经写过文章讨论宗教的社会作用,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王先生:宗教可以弥补法律之不足。法律强调制裁和约束人的行为。宗教,则是从人心入手,在思想上劝善。而人的思想,就是法律难以触及的地方。举例来说,佛教的因果报应论,以及“众善奉行,诸恶莫作”的宣传,可以从动机上制止人为恶,净化社会,对社会起到积极作用。

记者:这对现在构建和谐社会也是有益的。

王先生:是的。另外,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民族、宗教自身的和谐也很重要。民族、宗教问题常常联系到一起,比如伊斯兰教和信仰伊斯兰教的10个民族,藏传佛教和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蒙古族等。民族、宗教问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国防、经济、政治等诸多方面,如果出了问题,会对整个国家的和谐稳定大局产生重大影响。作为宗教工作者、宗教文化研究者,应该深刻认识到在我们这样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应该将民族与宗教的和谐放到极其重要的位置。为达到民族、宗教和谐的目标,首先是尊重——然后是了解、沟通——最后达成合作、和谐。不信教群众与信教群众之间,以及不同宗教之间,要以宽容精神相互看待,对话比对抗好,和谐需要对话。

责任编辑 田悦阳